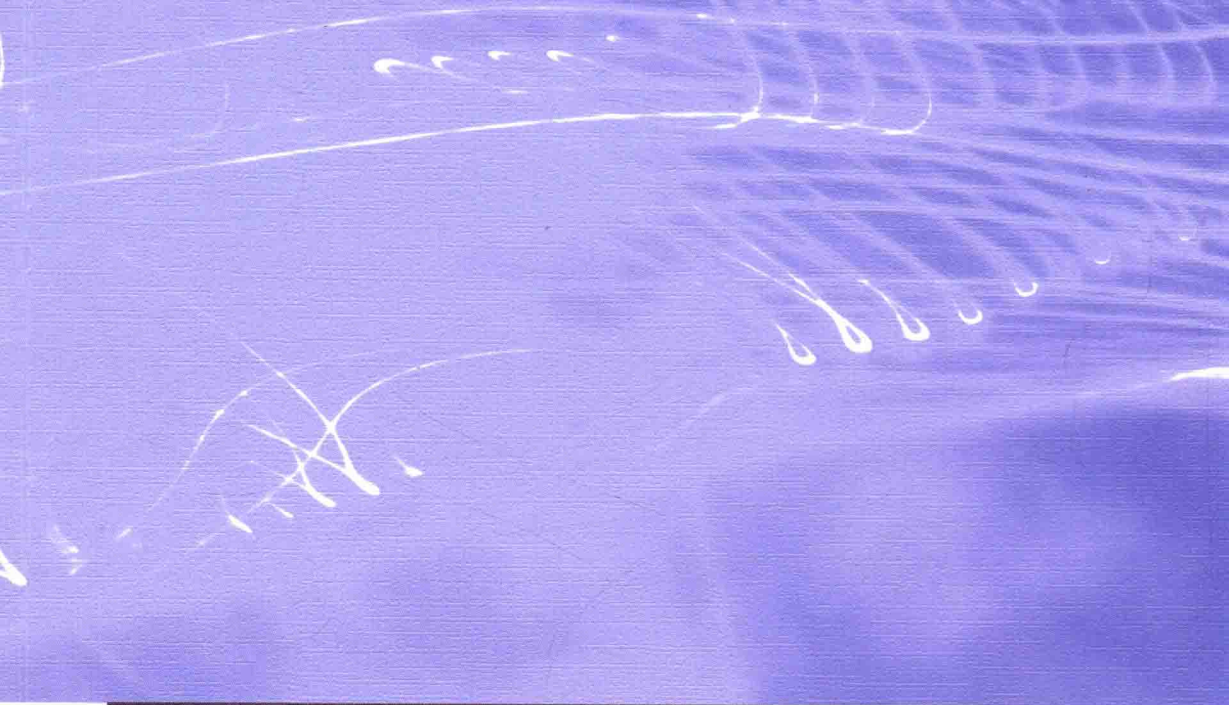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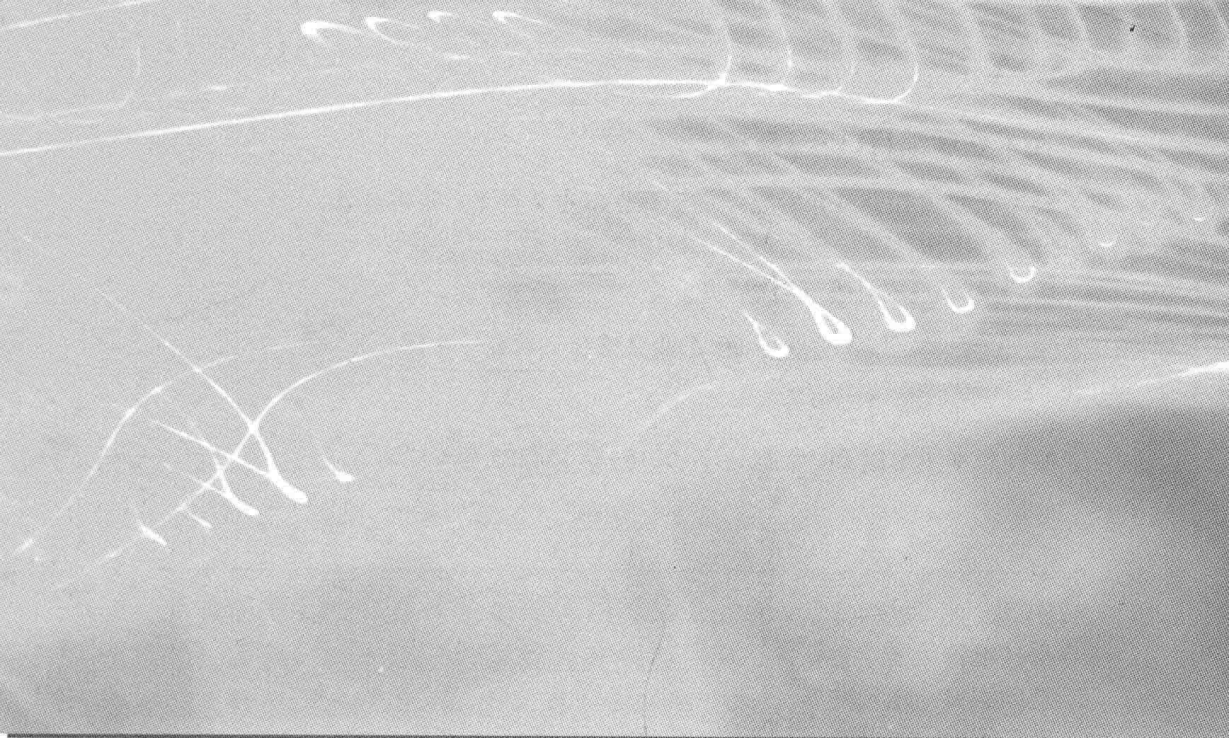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

张番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

张番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 / 张番红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161-8519-3

I. ①转… II. ①张… III. ①社会整合—研究—中国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428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陈 琳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02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甘肃政法学院2014年度校级重点科研项目“转型
期我国社会整合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最终成
果（编号：GZF2014XZDZZ04）

甘肃政法学院重点学科阶段研究成果

甘肃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库

序 言

张番红博士的专著《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即将付梓出版，力邀我为其撰写序言。该著作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作为其博士生导师，我亲历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开题、撰写、成稿、修订、答辩以及后期反复修改与完善的全部过程。所以，我对这部著作有着特殊的情愫、感受和体悟。

经济新常态下，在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遭遇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为核心的“五大发展”新理念引领科学高效的社会整合体制机制建设，并全面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旨在实现近代百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等美好图景和价值诉求。可见，该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向性。该著作选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场景，以“我国社会整合”为研究对象，站在社会学立场上，从全球化与现代化出场，由转型困境切入，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视角，通过批判性反思和合理借鉴西方社会整合与我国传统社会整合思想，并联系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的新形势、新变化与新问题，探讨我国社会整合问题。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比较新颖。

一是通过文献梳理对“社会整合”及其“转型期”概念与含义进行了学理界定，详细厘清并中肯评介了中西方有关社会整合的基本理论，及其研究范式的时代价值和有益启示。

二是分析和论述了唯物史观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整合理论的逻辑元点，同时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唯物史观中蕴含的社会整合理论基本观点。

三是以纵向论述方式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整合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和准确的梳理与概括。同时,着力以历史眼光探析了转型期由于社会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分配体制、就业体制等诸多领域变迁导致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扩大、资源分配不公,以及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等我国社会整合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其要解决的新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系统结构稳定,客观上需要社会整合的干预和熨平、消解弥合与积极调适,以维持社会协调运行和有序发展,促进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建设。接着深入阐释了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及其内在结构和实践路径选择。

在我看来张番红博士的这部著作“问题意识”明确、主题突出,全文紧扣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做到了层次分明且逻辑严密,文献梳理较为系统而全面,对其评述也还客观中肯而富有创见,表明作者对该研究领域的把握和理解比较深入。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整合理论的总结与概括显示出作者比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理论功底和修养。对于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面临的机遇、挑战和新问题的总体性分析与把握比较深刻和到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社会整合理论与实践探索历程的整体性把握符合实际情况,关于其阶段性特点的论述有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的较有力支撑。该著作提出的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具有充足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且社会整合路径选择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一定的实践价值。该著作观点明确、结构完整、注释充足、写作规范、论证充分。总体上较好地体现了作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应具有的学术性、理论性和现实指向性。

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项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问题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高频关键词,也是热点命题,其涵盖领域比较广泛。作为初涉该课题研究的青年学者,该著作还有待在理论研究和深度挖掘方面给予进一步探讨性关切与回应,这也是该著作亟须改进和完善之处。总之,作为张番红的博士生指导教师,我很高兴看到其学术著作出版问世,也很乐意向大家推荐一读。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王宗礼教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转型期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	(36)
第一节 转型期是透视社会分化与整合的特定时空场域	(38)
一 国内学者视野下的社会转型内涵结构	(38)
二 国外学者视野下的社会转型内涵历史轨迹	(43)
三 我国近现代以来的四次社会转型之旅	(47)
第二节 转型期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理论阐释	(51)
一 西方社会整合理论的生成背景归纳与代表性观点 审视	(52)
二 我国传统社会整合理论的背景归纳与代表性观点 审视	(60)
第三节 转型期国内外社会整合理论的当代价值与 有益启示	(66)
一 西方社会整合理论的选择性借鉴与当代启示	(67)
二 我国传统社会整合理论的选择性借鉴与当代 启示	(70)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社会整合理论及其发展	(74)
第一节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整合的理论基础	(75)
一 人类社会是在实践发展中的矛盾有机体	(76)
二 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根本动力	(76)
三 社会矛盾在实践发展中的永恒性	(77)

四 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指向消灭社会对立,构造 “自由人联合体”	(78)
第二节 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整合理论的主要内容	(84)
一 唯物史观中蕴含的社会整合思想	(85)
二 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社会整合观表达	(90)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整合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93)
一 社会主义建设艰难探索时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社会整合理论	(93)
二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社会整合理论	(95)
第三章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03)
第一节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的内在规定性	(104)
一 社会整合的动力中心旨在调适以“利益”为核心的 社会关系	(106)
二 社会整合实践表征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辩证统一	(106)
第二节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面临难得机遇	(114)
一 国际政治经济技术诸要素变化给我国社会整合带来 新机遇	(114)
二 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变化给我国社会整合带来 新机遇	(117)
第三节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遭遇严峻挑战	(118)
一 国际大环境风云变幻给我国社会整合带来挑战	(120)
二 国内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给我国社会整合带来挑战	(122)
三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快速发展给我国社会 整合带来挑战	(125)
第四节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新问题	(129)
一 社会结构急剧分化	(130)
二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141)
三 思想价值观念深刻变化	(143)
四 资源与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以及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 日益凸显	(143)

第四章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实践与探索	(145)
第一节 转型期从传统体制向现代新体制的转换与变迁	(145)
一 优化市场经济体制,科学安排政府和市场关系	(146)
二 经济体制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要求	(148)
三 体制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149)
第二节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的探索与演进	(149)
一 改革开放前的集权化治理结构与管制型机械刚性社会整合	(151)
二 改革开放以来的有机柔性社会整合	(153)
第三节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整合的探索与实践	(158)
一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实现社会整合的探索与实践	(158)
二 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改革中的社会整合探索与实践	(163)
三 新时期新阶段的和谐社会整合探索与实践	(168)
第五章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目标、任务与基本原则	(179)
第一节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目标	(180)
一 理顺社会关系,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180)
二 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182)
三 增进民族团结的稳固发展	(183)
四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中国梦”	(190)
第二节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任务	(192)
一 依法治国基础上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扩大	(193)
二 有效调节国家和个体的利益分配与再分配关系	(198)
三 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0)
四 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02)
第三节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基本原则	(207)
一 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	(208)
二 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实现社会稳定	(208)
三 坚持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209)
四 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着力遏制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217)

第六章 转型期推进我国社会整合实践路径选择	(219)
第一节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内在结构和着力点	(220)
一 制度是社会整合的基础和保证	(220)
二 经济是社会整合的“源代码”与核心前提	(223)
三 政治是社会整合的“阿莉阿德尼线”	(225)
四 文化是社会整合的“强化剂”	(227)
五 价值观是社会整合的重点与难点	(229)
六 民生是社会整合的落脚点和最终归宿	(233)
七 法律是社会整合的依据和保障	(237)
第二节 转型期完善我国社会整合基本领域	(240)
一 完善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241)
二 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243)
三 完善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	(245)
四 完善我国的文化整合体制	(249)
五 完善我国的生态整合体制	(251)
第三节 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机制体系框架结构分析	(253)
一 利益与收入分配调控机制	(255)
二 政治参与机制	(261)
三 社会沟通与流动机制	(264)
四 区域联动均衡与矛盾协调机制	(266)
五 生态治理长效机制	(267)
结束语	(274)
主要参考文献	(278)
后 记	(293)

绪 论

“问题意识”^① 表征主体在透析客体过程中，能动反馈出问题生成的质疑困惑与好奇探究的概念逻辑、印象认知、理解判断、心理状态与价值取向的总和。“问题意识”蕴含科学研究的最鲜明风格。有学者研究显示，意识到“问题存在”是理性思维的起点和原始创新的基础，没有“问题的思维判断”是盲动与肤浅的。所以，奥裔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认为，任何科学研究都是源起于“问题”开始^②，此所谓“学从问生、思从疑始”。“问题意识”作为科学研究的基因密码，彰显理论探索的逻辑元点，映射个体思维的“问题性”心理特质与优秀品格。可见，“问题意识”对于科学研究至关重要。德裔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认为，科学研究中的“提出问题”远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且更困难^③。而我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暨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归结为学切身体会时指出，能够发现“问题”只是做学问的起点，倘若科学研究找不出“问题”，那便无学问可言。由此简明扼要地阐释了但凡理论创作和学术研究，概由生成“问题意识”而得来^④。因此，培育“问题意识”，要着力于养成“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与解决问题”，并“以简驭繁、融会贯通”的良好思维素质与境界习惯，以此聚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间正

① 何怀宏：《问题意识（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辩集粹书系）》，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英]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

③ [德] 爱因斯坦、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周肇威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④ 戴逸：《二十世纪中华学案》（综合卷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道”。转型期^①，置身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广阔场域下，伴随全球化浪潮与“新五化”^②运动快速深入与交织推进，“改革再出发”^③号角已经吹响，具有强大社会激励保障和功能调控正能量的我国改革开放作为一种最现实“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④和转型期最鲜明的时代符号，嵌入现代性让我国分享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丰硕成果，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生产力获得巨大释放、经济平稳较快发展^⑤、人民生活显著提高^⑥、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公平正义理念的根基更加牢固，社会各系统纵深以一种爆炸性巨大变化、翻天

① 本书中“转型期”是指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党的制度建设等各系统诸领域发生至为广泛而深刻的变迁，是透视新常态下我国社会整合的特定时空场域。

② “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新中国的奋斗目标，从1950年到1960年我国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构想正式确定为总体国家规划。伴随有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道路，旨在助推“新四化”深度融合、良性互动与协调促进并同步发展。接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全新思路将“全面深化改革”总体目标明确设定为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是外界所理解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映射执政党科学因应世界局势变迁，彻底指向现代化转变和长期执政的战略谋划。随后，在2014年2月17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表征执政党层面“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五化”理论命题正式出场，彰显我国社会发展重要里程碑。《外媒：习近平为何提出“第五个现代化”》（<http://news.sohu.com/20140814/n403439698.shtml>。2014-08-14）。

③ 王波明：《改革再出发：深化中国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

④ 黄勇：《邓小平社会运行理论的基本点：激励与整合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邓小平理论》2003年第5期。

⑤ 改革开放以降的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相继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首次自由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发优势增长”阶段，20世纪末由精英阶层主导的“不可持续与过度投资”阶段，一直延续到党的十八大开启“再次自由化启蒙”阶段这样一个跌宕起伏的周期性发展轨迹。《专家称中国经济正处在第四个发展阶段》（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620/12580090_0.shtml。2014-06-20）。

⑥ 有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10.39万亿美元，在世界诸国中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随之，2015年底我国人均GDP近7800美元。诚如林毅夫教授推演，我国在2020年人均收入有望达到12700美元，并成功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而实现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覆地全新姿态和“当惊世界殊”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充分展现了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正能量。西方学者誉之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①，也彰显了“中国体制的巨大优势”^②。与此同时，快速蔓延的现代化裹挟在转型中牵引和助推全球化向世界历史嬗变，驱动世情、国情、民情、社情、政情和党情演进持续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有学者喻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③。缘于社会整合机制与治理体系滞后，由此遭遇市场经济“两重性”引起的社会结构断裂失衡与经济伦理缺位、消费与交往行为失范、权力寻租与阶层固化问题加剧、社会不公与张力扩大、管理与价值错位、人文精神衰微与“潜规则”^④盛行、诚信缺失与信任危机、个体价值观念变异与精神生活非理性化、快速城镇化^⑤与生态环境脆弱化、超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与人口红利消减^⑥以及与GDP数据相匹配的道德水平和价值体系有待完善等异质性社会问题相互叠加伴生并导致成

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巨大经济奇迹，这种快速发展在西方学者眼里不符合主流经济学理论逻辑和预设框架构想。因此，以英国经济学家彼得·罗兰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将之称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② 举国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李文云：《高效是中国体制的巨大优势》，《环球时报》2013年8月20日。

③ 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版。

④ 最早由吴思教授提出该命题，在我国是一种由来已久且独具特色“权力至上、金钱万能和人情第一”的“反法制”社会现象，是看起来为正式体制所不容且被批判的规则，却是渗透到现实生活中最为有效的“权大于法、钱大于权”游戏法则。“潜规则”盛行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滋生社会焦虑，是建设法治社会的最大障碍。只有立“明规则与硬规则”，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破除潜规则、陋规则。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⑤ 截至2015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71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0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034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520万人。城乡人口数据的一增一减，使得我国城镇化率已快速上升到56.1%，而农村人口进一步下降到43.9%（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601/19/t20160119_8371558.shtml）。

⑥ 改革开放以来，充足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第一位财富源泉。腾泰、范必等：《供给侧改革》，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然而，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未富先老的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抑制因素。目前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约2亿，占总人口的14.9%且正在呈逐年加速上升趋势。预计21世纪上半叶，我国老年人口占全世界老人总量将达到1/5，从而快速成长为超老年型国家。李红梅等：《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约2亿，其中近一半处于“空巢”状态》，《人民日报》2014年2月14日。

长中的连锁烦恼和不可避免的“变迁性社会问题”^①、“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②、“特殊人群社会问题”^③以及“四大背景式问题”^④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⑤，诱发社会成员心头笼罩一层“雾霾”，不禁使人怀念“寒门英杰辈出”^⑥那个时代最温暖人心的变迁，映射现代性悖谬^⑦与转型困境可能引发新常态下我国社会整合危机^⑧。诚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所言，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⑨，加之持续发酵的全球金融危机也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让我国社会整合面临严峻风险与极大挑战。有识之士意识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整合正当时。

在此，合理选择与批判性借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描述19世纪工业革命后凸显的社会问题并解剖其根源于“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危机的时期，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莫过于近百年来欧洲社会传统的集体纪律已经丧失其权威。”^⑩并指出“道德领域的起点就是社会领域的起点。”^⑪历史叙事一再启迪我们，这种不平衡、不协调与不可持续性问题集中投射和聚焦于社会层面并指向转型期我国社

① 童星：《世纪末的挑战：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③ 朱力：《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④ 吴晓林、李昌清：《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四大背景式问题”》，《学习月刊》2012年第1期。

⑤ 转型期我国遭遇的增长问题，环境与民生、作风与腐败问题，以及国际问题等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质言之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郑剑：《科学对待“过程中的问题”》，《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5日。

⑥ 迄今为止，“高考”依然是适合国情的有我国特色的社会性选拔人才最公平且最为有效的考试制度设计（<http://news.xmu.edu.cn/s/13/t/33/2d/fd/info11773.htm> 2013-06-06）。

⑦ 现代性在西方的缘起和孕育生成，既有效驱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优化了社会结构，提升了社会良序。与此同时，在新旧交替过程中又衍生出诸多社会问题，权且称之为现代性悖谬。袁君刚：《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分析现代社会秩序的两种逻辑》，《理论月刊》2011年第7期。

⑧ 有学者认为，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遭遇因法治错位而衍生的“法律、体制、市场和路径”等四大困境。马宇：《深化改革面临四大困境》，《中国经营报》2014年7月12日。

⑨ 吴敬琏：《中国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9-10）。

⑩ Emile Durkheim, *Moral Edu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1: 101.

⑪ Emil Durkheim, *L' éducation Moral*. Paris: Librairie Félix Alcan, 1925: 68.

会整合。基于此考量,本书立足于全球化与现代性破茧出场所衍生和释放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①图景作为《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切题逻辑起点与言说现实依据,以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每个人都尽享人生出彩机会,切实践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努力促进国家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更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社会整合生态机制体系,着力化解突出矛盾与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旨在实现马克思预设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并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愿景,成为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的最终归宿指向和根本价值追求。

一 选题目的和意义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②、是实践起点和理论创新的源泉,也是时代再现本体精神状态的最实际呼声。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已经成为这个火热时代的迫切呐喊,也是实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抓手^③,对于科学应对新常态下社会问题具有积极的学理

① “社会问题”容易诱发社会风险与危机,所以有学者提出,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不容低估”观点。邱震海:《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

③ 有学者认为,中国在21世纪的迅速崛起和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是举世瞩目的壮观景象和必然趋势,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嵌入全球政治、安全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并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应当为人类和平与共同繁荣做出新贡献,其理想目标不是重建往昔的“中华帝国或中国统治世界”,也不是在霸权轮替的角逐中化身为“新霸主或天下帝国的重归”,而是着力从根本上改变霸权结构本根,最终促进人类走向公正和平与对话共建取向的“后霸权世界秩序”,即成为一个致力于终结霸权逻辑的大国。《中国的崛起不应该是重建“中华帝国”》(<http://news.sina.com.cn/zl/Ruijian/2016-02-02/09365377.shtml>, 2016-02-02)。

价值和鲜明的实践意义。

（一）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与探索实践的现实需要

理论是适应现时代要求而孕育生成，客观上要求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①，这既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映射于现实的关照与回应。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及其经典呈现，与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共同结合为体系紧密的有机整体。转型期我国社会整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或缺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构建新社会的宏伟蓝图中，始终将社会整合视为一个重要抓手。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工程，实践“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更是须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社会整合理论的指引和规范。同时，随着时代境遇变化，社会整合应更多反映社会诉求和期盼，体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映射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深化认识与科学判断，以及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协同治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的社会整合新视界而与时俱进。所以，社会整合是推进和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指向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本质要求，彰显转型期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诉求，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必然选择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二）释放社会活力、弥合社会矛盾，彰显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关照情怀

现代国家基本职能之一就是推进社会适度分化与整合。作为发展中超大型国家，我国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够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页。

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①以熨平现代性催生的社会“碎片化”^②，用科学的社会整合收缩现代化生成的离心力。改革开放以降的剧烈社会转型，极大地增促我国连续保持世界少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伴随现代化突飞猛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及时出场，协同助推了国家巨大转型，使我国在较短时间赢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发展成果。当前新常态下，我国迈入深化改革发展关键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和胜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③关键期，经济体制转型升级、政治体制稳步推进、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共同冲击和碰撞主流意识形态，面对多元文化观念交流交锋交融的复杂变革情势，既释放社会发展巨大活力，也引发诸多严峻社会问题。如何应对和破解如上困境与挑战，以胜利化解矛盾与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及时给出了关切和回应，社会建设事关民生福祉和幸福安康，应着力在发展经济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基础上，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与诚信友善”为关键词的国家、社会和个体等“三维”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利益诉求。因为利益是主体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中介，以社会实践为手段，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的矛盾状态得到克服”^④，

①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32页。

② 转型期我国社会“碎片化”格局蕴含社会结构尚未定型、社会态度与行为取向的多样性以及价值认知的差异和冲突等若干要素。李培林、陈光金、张翼、李炜等：《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③ “中等收入陷阱”，又称为“拉美陷阱”，表征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多种原因致使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与增长方式转型，导致内生增长新动力不足、经济停滞不前、贫富分化加剧、城市化进程受阻等社会矛盾凸显状态。我国是否会进入“拉美陷阱”，及其规避策略也是近年来学界广泛讨论的话题。刘福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南风窗》2011年第16期。党国英：《惟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南方都市报》2011年9月5日。江时学：《“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

④ 王伟光、郭宝平：《社会利益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